

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易成栋 高波阳 黄友琴

【摘要】文章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人户分离人口包括市内人户分离和常住外来人口两类人群,前者大多是由于城市内部的经济社会差距和住房方面的原因迁移,主要是户口福利造成的人户分离;后者更多是由于地区经济差距和就业方面的原因迁移,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人户分离。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不断上升,并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集聚,两类人群的集聚区在空间上小部分重叠,大部分毗邻,前者位置更好。人户分离人口居住区位分异程度逐步上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常住外来人口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更加隔离。人户分离人口空间集聚区受住房、公用资源的布局与分配及个人的收入和移民身份等影响,反映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户籍 人户分离 常住外来人口 居住分异 北京市

【作者】易成栋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教授;高波阳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副教授;黄友琴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地理与规划系,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在现有的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下,城市一些人口发生了户籍和居住迁移,成为人户一致人口;一些本市户籍人口出现了在市内跨街道迁居,但户籍没有迁移,成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及其亲属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不能迁入户口,成为常住外来人口。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1356.9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961.2万人,增加了604.3万人。其中人户分离人口(居住在本地和户口不在本乡镇街道)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从35.1%增加到53.5%,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具有本市户口,居住在本地,但户口不在本乡镇街道)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从16%增加到17.6%,常住外来人口(外省来京人员)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从19%增加到35.9%。

* 本文为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委托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从绝对值来看,北京人户分离人口增长较快,增加了 574 万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了 127.9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趋势,增加了 461.1 万人。北京增加的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尽管都是人户分离,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在获得住房和公共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现有研究分别分析了常住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特征、空间分布、原因、影响和政策设计(周海旺、杨昕,2002;侯亚非等,2012;段成荣等,2012;翟振武、侯佳伟,2010)。但现有研究没有从街道尺度和纵向维度准确刻画两类人群的空间集聚模式和空间关系,并测度其变化。北京作为特大城市面临的人口快速增长和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出。本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试图分析北京市两类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为城市发展和规划、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北京市两类不同人群的人户分离情况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的户口登记地不同。前者为北京市户籍,后者户口登记地在北京以外的省份。2010 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周边的河北、河南、山东省,以及人口输出大省安徽和四川。这说明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流出大省之间的差距吸引了人口流入。现有的户口和城市管理制度决定了前者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后者则成为城市里“失根”的非市民(Solinger,1999),不享有同等的权利。

与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相比,常住外来人口的男性比例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高 5 个百分点;20~54 岁中青年适龄劳动力的比例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高 14 个百分点;6 岁及以上常住外来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低 27 个百分点,高中学历人口比例低 4 个百分点(见表 1)。常住外来人口的单身未婚比例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高 10 多个百分点。常住外来人口集体户比例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高 26 个百分点。常住外来人口农业户口比例比本地人口高 46 个百分点。可见,常住外来人口主要为农业户籍的外地农村移民。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平均人户分离时间比常住外来人口更长。在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 5 年以上的占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接近 50%,比常住外来人口该比例高 14 个百分点;离开户口登记地 3~5 年的占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接近 1/4,比常住外来人口该比例高 3 个百分点;离开户口登记地 1~3 年的占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略高于 1/4,比常住外来人口该比例低 10 个百分点;离开户口登记地 0.5~1 年的占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略低于 1/10,比常住外来人口该比例低 7 个百分点。49.4% 的常住外来人口已经在京居住 3 年以上,成为长期居民。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主要是因就业而移民,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则主要是由于住房变动而搬迁,Chi-square 检验在 0.001 水平下统计显著。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中务

表 1 2010 年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与常住外来人口情况

%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常住外来人口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常住外来人口
男性	49.4	56.3	学习培训	8.2
20~54 岁人口	66.6	80.6	随迁家属	13.9
高中学历	23.6	20.0	投亲靠友	7.3
大专及以上学历	51.1	24.4	拆迁搬家	30.2
平均人户分离时间(年)	5.5	4.4	寄挂户口	3.5
迁移原因			婚姻嫁娶	7.7
务工经商	12.0	73.9	其他	10.7
工作调动	6.5	3.6		1.5

注: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工经商的比例较高,为 73.9%;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由于这一原因而迁移的人数仅占 12.0%,所占比例较小。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因拆迁搬家的比例较高,为 30.2%;常住外来人口中因拆迁搬家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比例为 0。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随迁家属的比例也较高,为 13.9%;外来人口这一比例为 8.0%,比前者低 5.9 个百分点。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因学习培训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比例为 8.2%;外来人口这一比例较低,比前者低 3.5 个百分点。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由于婚姻嫁娶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比例也较高,为 7.7%;外来人口这一比例较低,比前者低 4.8 个百分点。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因投亲靠友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比例为 7.3%;外来人口这一比例较低,比前者低 2.8 个百分点。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因工作调动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比例为 6.5%;外来人口这一比例较低,比前者低 2.9 个百分点。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中寄挂户口的比例最低,为 3.5%;外来人口的这一比例几乎为 0。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与常住外来人口的人户分离原因不同。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迁居后户口登记地的选择主要受户口福利的影响。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很多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全部附加在户口之上,形成了户口福利,是影响城市户籍居民户口迁移选择和住房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北京,拥有某些地区(如西城、海淀)户口的居民可能更容易花费很低的成本上优秀的公立学校。这引发了一些市民为了孩子上优质公立学校购买学区房,也引发了一些城市居民购买新房迁居后,选择将户口留在原户口登记地。还有一些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可以迁移户口,但嫌办理手续麻烦,或新小区的户籍管理和房屋管理衔接不上,因而没有迁移户口。此外,北京还存在一些家庭自有多套住房,按照一个户口对应一个地址的原则,他们也会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户口登记地。他们对户口登记地的选择同样受户口福利的影响。对于本市户口的租房者,根据北京市户籍管理政策,租房(商品房或公租房)无法落户,因此不会受居住地户口附加的福利影响。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户口登记地和实际居住地的分布关系证明了户口福利的影响。市内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户口登记地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占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总量的 77%,因为

这4个区集中了北京大量优质公共资源,拥有这些区域的户口可以低成本获得某些公共资源。由于北京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只有极少数经过审批的外来人口才能获得北京户口,绝大多数常住外来人口即使在北京购买了住房也无法迁移户口(特定时期购房可以获得小城镇户口,该政策在2005年已经取消),因而不能获得附加于户口之上的公共资源与服务。即使在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后,常住外来人口通常只能得到较差的公共资源,或花费更高的成本才能享受优质的公共资源,因此不会受到户口福利的影响。

二、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一) 北京市总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总体而言,北京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现象更加严重,户口登记地和居住地空间距离拉大,并且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聚。2010年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4%,跨行政区人户分离人口比例为46%,其中市内跨行政区人户分离人口占10%,市外迁入人口高达36%(见表2)。2010年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为27.5%,比2000年上升了7.7个百分点。而且市内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占总户籍人口比例高于区县内跨街道的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区县内人户分离人口为主发展成2010年区县内和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并存,并且出现后者略高的局面。从功能分区来看,2010年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该区总人口比例(18%)高于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区(15%)。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市内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比例高于区县内跨街道人户分离人口比例,生态涵养发展区以区县内人户分离为主(见表2)。

总之,北京人口相对集中,但已经出现郊区化,不同人群的郊区集聚态势不同。近1/3的人口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31%的人口分布在城市发展新区,11%在首都功能核心区,10%在生态涵养发展区(见表2)。各类人口的分布基本与城市总人口的空间分布形态相符。本市人户一致人口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主要是住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33%),以及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17%)。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在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集中度最高(分别为41%和54%),住在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比例较低(分别为8%和4%)。常住外来人口住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的比例是三类人群中最高的,与市内人户一致、人户分离人口有明显的不同。

(二)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呈现近郊集聚趋势,并沿着交通干道向外拓展(见图1)。下面将结合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就业中心等社会经济特征划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乡镇街道总人口20%以上、最高达57%的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北京二环以外到五环附近。(1)八达岭高速公路以东向北部延伸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并向东部拓展到京顺路附近,为最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它包括朝阳区从东北三环京

表 2 2010 年按户口登记地及居住地关系分类的北京常住人口分布

%

分 区	户口登记地分类					总人口	人口分类		
	本乡镇	本县(区)内	跨县(市、区)				人户一 致人口	市内人户 分离人口	常住外 来人口
	街道	跨乡镇街道	小计	市内跨区	市外				
北京市	45.9	8.1	45.5	9.5	35.9	100	100	100	100
首都功能核心区	59.1	5.5	35.2	9.9	25.3	11	16.8	9.6	7.8
城市功能拓展区	41.1	8.3	50.0	10.3	39.7	33.5	33.5	40.6	53.8
城市发展新区	41.7	7.4	50.1	10.3	39.8	30.8	33	31	34.1
生态涵养发展区	68.4	11.9	19.2	2.7	16.5	9.5	16.7	7.9	4.4

注:根据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石景山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其他远郊区县,含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

顺路附近向北和东北延伸到北五环和东五环附近的集聚区,并且向北延伸到靠近八达岭高速公路的昌平区的一些大型居住区,如回龙观和天通苑;向东北延伸到东四环附近的大型居住区,如望京。(2)CBD 周边往东延伸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从朝阳区东二环向正东延伸到东五环附近的集聚区,并且主要集中在东四环和东五环之间,向东延伸到与之毗邻的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通州部分地区。(3)南部二环路向南延伸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为最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它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从丰台部分二环内街道延伸到五环,位于北京城区的西南方;二是与之毗邻的东南五环附近的大兴区部分街道。(4)八达岭高速公路以西的西部和北部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占总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比例相对较小,从石景山区地铁一号线终点站周边延伸到门头沟区城关镇及附近几个街道,以及海淀区与石景山区、昌平区交界的少数街道,位于北京城区西部或靠近城区的西北部。(5)远郊的县城及开发区,如怀柔、密云等。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五环附近,靠近主要就业中心,如东部的 CBD,西部的金融街、中关村,南部的亦庄开发区;靠近交通干线,如快速公路环线、地铁线、城际高速公路。与 2000 年相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数量增加较快,在近郊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形成了一些大型集聚区,并且沿着交通快速道向外拓展;在远郊的县城和开发区形成了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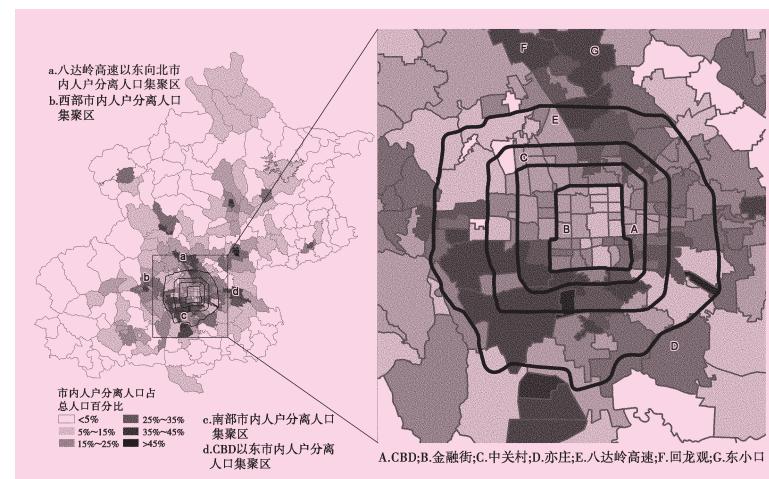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北京按乡镇街道分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分布状况

密集区，但密集程度不如近郊区。

(三) 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不均，更加向城市外围集聚。如按上述方法划分以下常住外来人口集聚区，其常住外来人口占乡镇街道总人口40%以上，最高达91%，主要分布在三环外，集中在四环至五环和五环至六环之间（见图2）。（1）八达岭高速公路以西外来人口集聚区，从海淀区西北三环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六环路，主要集中在五环路附近，以及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交界处的部分街道。包括三环外新开发的大型商品房居住区（如万柳、四季青地区），以及一些高档的居住区（如香山附近的别墅群），还有一部分为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2）八达岭高速公路以东外来人口集聚区，从东四环向外延伸到六环路，主要集中在五环至六环之间，包括朝阳区北三环向西北方向延伸到昌平区的六环路，向东北方向延伸到顺义区的六环路，向东延伸到通州六环路附近。它包括新开发的中高档商品房，低档商品房、城中村住房等不同类型。如顺义后沙峪的别墅群，通州梨园的低价商品房，以及五环附近的大量的城中村。（3）南部外来人口集聚区，从南三环往外延伸，集中分布在南五环附近，包括五环以内的丰台部分街道，五环外的大兴部分街道。（4）六环路以外远郊县城及一些工业开发区外来人口集聚区。如位于北部远郊怀柔区行政中心和雁栖开发区，以及北部远郊密云县工业开发区。与2000和2006年的外来人口空间集聚模式（翟振武、侯佳伟，2010）比较，常住外来人口集聚区向外拓展，在城市发展新区增多，在五环附近最高，五环到六环和六环外及南部地区也有所增多。可见，随着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集聚区不断往外推移。

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常住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布有以下特点：一是在二环以内的北京老城区，常住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都较低；二是在五环外的远郊区，常住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郊县行政中心和工业园区比例较高，出现了空间集聚，而在郊县其他地方比例都较低；三是在二环到五环附近都出现了一些大范围常住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聚居区，二者在东北部、东部、南部的聚居区小部分重叠（如东小口），大部分毗邻，在西部常住外来人口集聚区较多，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很少。市内人户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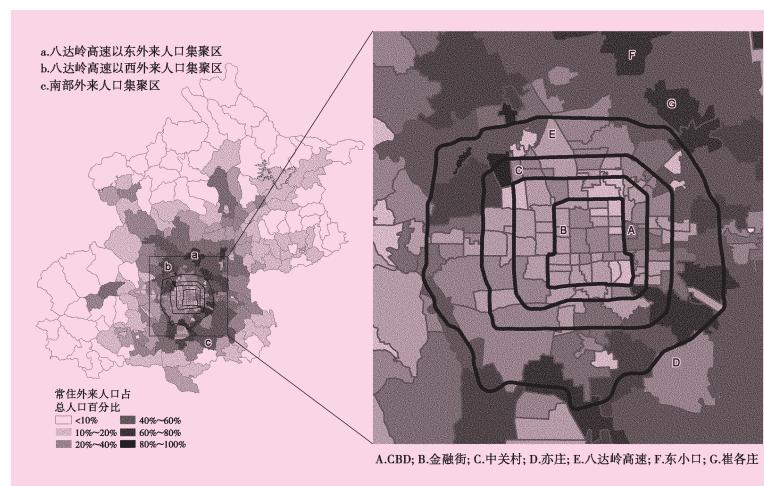


图2 2010年北京按乡镇街道分的常住外来人口分布状况

人口的集聚区通常比常住外来人口集聚区的区位要好,更靠近城市中心,交通也更便利。主要表现在前者在二环到四环的比例较高,而后者在四环到五环,以及五环外的比例较高。

(四) 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居住区位隔离加剧

人口迁移的空间结果通常是居住空间分异和隔离(Park 等,1967)。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了相对稳定、均质和单一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异质的空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并反映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需求和住房偏好的差异(黄友琴、易成栋,2009)。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北京人户分离人口与人户一致人口的居住区位隔离程度加大,并且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更大。

这里用居住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来衡量居住分异和隔离的程度(Massey 等,1993)。居住分异指数计算公式为: $D=\frac{1}{2} \sum_i \frac{t_i |p_i - P|}{TP(1-P)}$ 。其中 t_i 和 p_i 分别为 i 乡镇街道的总人口和少数民族群体的人口占该乡镇街道总人口的比重, T 和 P 为城市或区域的人口规模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比重(以城市或功能区为总体)。孤立指数(P_x^*)计算公式为:

$$P_x^* = \sum_i \left(\frac{x_i}{X} \right) \left(\frac{x_i}{t_i} \right)$$

其中, x_i 和 t_i 是 i 乡镇街道的 x 类人口和总人口数, X 是城市或功能区总体的总人口数。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本文以乡镇街道作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计算了以北京市域为总体,并按照空间分类计算了 2000 和 2010 年人户一致人口和人户分离人口(包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见表 3)。对于基于户口和迁移的居住分异,本地人户一致人口为多数群体,人户分离人口(包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常住外来人口)为少数群体。

居住分异指数取值范围为 0~1,指数越大,表示人口分异和孤立程度越高,即居住隔离程度越高。西方按照分异指数划分居住隔离程度的标准是低(0.3 以下),中(0.3~0.6),高(0.6 以上)(Massey 等,1993)。从城市总体来看,北京市 2010 年的居住分异指数比 2000 年高 10%,这表明居住隔离程度上升,尽管依然不是很高,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各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2010 年,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人户分离人口的分异指数达到或高于 0.4,为中等程度的隔离,并高于生态涵养发展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2000 年以来,城市各区的隔离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提高最快,其次是功能拓展区。这反映了随着北京市总人口的增长,总体和各区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增加,但是他们的分布并不均匀,出现了更加集聚的趋势,更加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

总体而言,2000~2010 年,北京人户分离人口的孤立指数上升了 39%。各区的人户分离人口孤立指数都在上升,并有较大分异。2010 年人户分离人口在城市发展新区和功能拓展区孤立程度较高,分别为 0.880 和 0.674,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较低,分别为 0.423 和 0.416(见表 3)。这反映了人户分离人口更加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

表3 2000、2010年北京人口的居住分异和孤立指数

地区	分异指数		孤立指数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首都功能核心区	0.078	0.385	0.304	0.423
城市功能拓展区	0.248	0.397	0.510	0.880
城市发展新区	0.368	0.406	0.377	0.674
生态涵养发展区	0.344	0.367	0.258	0.416
北京市	0.298	0.333	0.439	0.610

注: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街道数据计算。

地区的隔离程度较低。常住外来人口则有所不同,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隔离程度较低,其他区隔离程度略高。这反映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更加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一些特定乡镇街道,常住外来人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分布相对于其他区域均匀。

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中度孤立(0.445),比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孤立指数高0.21。各区孤立指数也有较大分异。常住外来人口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孤立程度较高(分别为0.459和0.488),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较低(分别为0.264和0.256)。这主要由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更大,分布更集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孤立程度最低,其他区略高(见表4)。这主要是由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数量少,比例低,分布相对均匀。这与分异指数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

表4 2010年北京市三分类人口居住区位分异

	分异指数		孤立指数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常住外来人口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常住外来人口
首都功能核心区	0.186	0.124	0.178	0.264
城市功能拓展区	0.238	0.266	0.226	0.459
城市发展新区	0.387	0.336	0.267	0.488
生态涵养发展区	0.410	0.313	0.235	0.256
北京市	0.295	0.312	0.235	0.445

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三、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北京人户分离人口的居住区位选择是在政府和市场机制作用下住房及配套的公共资源(交通、教育、医疗等)布局和分配,与个人的收入、偏好和移民身份作用的结果。北京人户分离人口的居住区位选择受到市区和郊区的不同的推力和拉力。一是市区的再中心化、人口疏解政策与高房价的推力。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政策促进了城市的再中心化,拆

区。这与分异指数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

这里根据2010年数据进一步将人户分离人口分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各类人户分离人口的分异指数均高于0.3,为中等程度的隔离。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隔离程度较高,而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隔离程度较低。常住外来人口则有所不同,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隔离程度较低,其他区隔离程度略高。这反映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更加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一些特定乡镇街道,常住外来人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分布相对于其他区域均匀。

掉了部分居住区,形成了一些新的就业中心(如 CBD、金融街和中关村),导致了这些居民的外迁。首都功能核心区旧城改造和文化保护区人口疏解政策促使这些区域居民外迁。而且房地产市场机制造成了城区高昂的房价,也推动了支付力不足的居民外迁。二是郊区丰富的低价住房、一定的就业机会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外迁的居民。近 10 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推动了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城和产业园区的开发,通过公共投资加强了这些新区的交通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了部分产业的外迁并在郊区形成新的就业次中心(如亦庄),实施住房保障政策在郊区开展了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采取住房市场调控政策引导开发商在郊区进行大型商品房社区的开发。低价的公交优先政策降低了郊区到市区的通行成本,也吸引了大量人口外迁和在近郊定居。

然而,市区具有较丰富的公共资源(如教育等)并与户籍挂钩,而郊区相对不完善的公共资源和生活配套设施,以及新建社区户籍管理和住房管理方面的协调欠佳,导致了外迁户籍居民将户口留在原地,成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因此,拆迁搬家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空间分布特征明显。结合图 1 可以看出,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是迁居到城区周边开发的大型居住区。例如,北部的保障房社区回龙观、东小口(天通苑)与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社区望京,东部的朝阳沿着京通快速道到通州的大型商品房居住区(如通州城区等),南部的丰台和大兴新开发的居住区(如方庄等);西部的沿着地铁一号线从石景山到房山的部分街道(如苹果园等);西部的海淀区西三旗等。这些地区地价和房价较低,住房面积较大,吸引了城区的人口外迁置业。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户口登记地和实际居住地的分布关系证实了拆迁定向安置和保障房的影响。户口登记地在东城区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在邻近的朝阳区和丰台区居住;户口登记地在西城区的人户分离人口,主要居住在邻近的丰台区,以及集中在朝阳区、昌平区的保障房社区,这与这些地区有面向东城、西城的拆迁定向安置住房和保障房有关。

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区位选择主要受市区高房价推力和郊区低房价拉力的影响。只有拥有本地城镇户口的人才能享受补贴性住房,如原有公房、保障性住房。近年来商品房出售基本上对所有人开放,公共租赁房允许少量的外来人口申请。常住外来人口主要从市场购买和租赁住房,仅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以在郊区产业园租赁公租房。常住外来人口购买和租赁房屋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居住地的房租和房价、就业及周边的公共服务和设施。由于大多数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能够买得起商品房的还是少数,因此比较偏好低价的郊区商品房和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出租屋,形成特有的外来人口社区。在外来人口集聚过程中,社会资本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业缘、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带来了空间集聚。此外,环境优美也是高收入外来人口居住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顺义的后沙峪和天竺,昌平的小汤山和北七家的别墅区。

由于近郊新开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以及管理跟不上,存在户口福利差

异,形成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集聚区。收入较低的常住外来人口也被吸引到了郊区,但随着近郊的开发,配套设施的完善,房价的上升,将他们驱赶到房价更低、配套不完善的更远的郊区和农村。因此,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都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形成了一些集聚区,但进入了不同的社区,形成了空间分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0年以来,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上升,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等近郊区集中,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两类人户分离人口的集聚区在空间上小部分重叠和大部分毗邻,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区位通常更好。人户分离人口的居住分异程度目前还不高,但出现了上升趋势,常住外来人口在城市某些区位的分异隔离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反映了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化更加明显。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是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差距和户口福利造成的。常住外来人口主要是地区经济差距和户籍门槛造成的。在政府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政策及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区再中心化、高房价和人口疏解政策形成了推力,郊区新开发地区一定的就业机会、大量低价的住房供应、便利和低成本的交通网络、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形成了拉力。这些推力和拉力与个人收入和移民身份作用,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集聚区,从而使社会分层空间化。

人口增长和流动给北京的发展带来了活力,然而,大规模的人户分离人口却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难题。目前的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如此大规模的人户分离人口将导致规划失误,郊区公共设施建设不足和市区过度并存,郊区基层社会管理力量不足和治安混乱等问题,这说明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改为以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为依据,由户籍管理转变为居住地管理。这还要求加强近郊区的规划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特别是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逐步取消户口上的附加福利,简化落户政策和办理手续等来减少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促进商品房和保障房小区的适度融合。

大规模的常住外来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给相对不足的资源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根据全国和北京的城市化阶段来判断,外来人口的规模还将会增加,居住隔离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如何控制人口规模,特别是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是北京在中央政府要求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政策下面临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北京需要重新定位城市功能,将功能在市区、郊区和都市圈进行分解,促进中心城区功能升级,部分功能和产业(如部分教育、医疗、科技、会展、低端服务业等)向郊区和都市圈疏解,配合住宅及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带动人口向郊区和都市圈中小城镇迁移,促进人口在更大空间范围的合理分布。同时,需要结合居住证政策来统筹设计外来人口市民化政策。这需要建立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思路,对长期

定居的移民基于对城市的贡献相匹配原则实行渐进式的赋权，逐步获得一些市民的权利，对暂时工作的移民需要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来引导他们合理流动，并通过产业园区宿舍、出租房屋管理实行小的居住集中和大的分散，实现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等(2012):《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状况及管理对策研究》，载于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编:《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 侯亚非等(2012):《北京市外来人口特征及迁移原因分析》，载于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编:《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3. 黄友琴、易成栋(2009):《户口、迁移和居住分异——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6期。
4. 翟振武、侯佳伟(2010):《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模式和发展趋势》，《人口研究》，第1期。
5. 周海旺、杨昕(2002):《中国城市人口人户分离状况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6. Massey D. and Denton N.(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Park R., et al.(1967),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Solinger D.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责任编辑:朱犁)

征集启事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面向国内外关注城市发展的各界有识之士，围绕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开展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征集要求：(1)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著作、译作均可参评(译著参评需经原作者书面同意)；应征作品要围绕主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和研究报告类正文篇幅为8 000~15 000字，著作和译作类邮寄作品两部，并提交篇幅为8 000~15 000字的内容概要；应征作品均需提交各300字左右的中、英文摘要并提供作者信息；每位应征者投稿数量最多不得超过2件，译作需注明原著者及其简况，作者署名以作品提交时为准。(2)征集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14年6月15日。提交应征作品应符合《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优秀成果格式规范》。(3)请登录“中国城市网”(<http://www.urbanchina.org>)，以邮寄或发送电子邮件(投稿邮箱:csrk@vip.126.com)的方式提交应征作品。同时请从“中国城市网”下载填写《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成果使用授权书》，经本人签名后传真或邮寄给组委会，提交电子版无效。